

党领导经济工作的政治经济学*

裴长洪 倪江飞

摘要：党领导一切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来所确立的重大政治原则。在理论上认识和阐明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的关系，党的领导与国家治理体系的关系，党的领导与经济工作的关系，党的领导与政府、市场的关系等问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课题。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政党、国家与法律的理论，以及政治与经济对立统一关系的理论是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党的集中统一以及全方位领导的基本依据，也是党领导经济工作的基本理论依据。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领导经济工作的主要目的是支援战争、为新民主主义政权奠定物质基础；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党的领导能确保法律的制定与实施，弥补法律滞后性和盲区，建立强有力的政府，使之有效行使国家经济主权和金融主权，从而成功改造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和国民经济结构；在政府治理难以企及的社会化和组织化程度低的领域中，党的领导担负着组织群众以及改革经济社会体制的使命。党的领导还是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成功联系起来的决定性因素。因此，党领导经济工作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理论范畴，也是当代中国文明发展的基本模式。

关键词：党的领导 经济工作 政府和市场 建党一百年

1922年，江西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的成立，拉开了我党领导经济工作的序幕。毫无疑问，党领导经济工作是我们党在过去近百年实践中所确立的重大政治原则，但是如何在理论上认识和阐明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的关系，党的领导与国家治理体系的关系，党的领导与经济工作的关系，党的领导与政府、市场的关系等问题，仍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深入研究的新课题。

一、党领导经济工作的理论依据

（一）政党与国家政权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阶级自其产生以来始终采取了对抗的形式。恩格斯指出：“以往的全部历史，除原始社会外，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①在阶级社会（奴隶制社会、封建社会以及资本主义社会）中，阶级斗争的形式具有多样性，其中，经济利益斗争贯穿于阶级斗争的整个过程，并且最终需要通过适当的政治斗争形式加以解决。因为阶级的实质是一个集团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所以二者的利益是根本对立的，以至于二者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不可调和。为了缓和二者的矛盾和冲突，并将其控制在一定“秩序”范围内，于是国家被统治阶级发明出来了。“国家是维护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统治的机器”^②。因此，国家是阶级斗争的必然产物。“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③，

* 裴长洪：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倪江飞：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博士后，电子邮箱：nijiangfei2014@163.com。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36页。

②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8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1页。

而“各阶级政治斗争的最严整、最完全和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各个政党的斗争”^①。现代意义上的政党诞生于资本主义社会，至今已有二百多年的历史。政党的首要任务就是夺取国家政权，正如列宁所指出的：“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②政党夺取政权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本阶级获得经济利益，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必须通过政治斗争的方式才能实现。总之，为了适应阶级斗争的需要，国家和政党在这种斗争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先后产生了。

阶级、政党和群众的关系不同于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关系。在阶级社会里，无论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如何变迁，都不能使其摆脱阶级的烙印。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③。在同一个阶级中，每个人因有共同的经济地位而拥有相同的意识、价值观念、主张等，从而形成了群众所具有的共同特征。因此，“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④资产阶级有资产阶级群众，无产阶级也有对应的无产阶级群众。无论什么时候，群众内部不可能一般的齐整，必定有先进和落后之分。党来自群众，是群众中的一部分人，是群众的先进代表。列宁认为，无产阶级政党是阶级的先进部队^⑤，是工人阶级中最先进、最积极、最觉悟的一部分，从而党的任务“绝不是反映群众的一般情绪，而是引导群众前进”^⑥。

国家（政府）外在于群众，凌驾于一切阶级之上。除了作为阶级统治的工具外，国家还具有社会管理职能。虽然社会管理的范围、深度以及方式随着社会生产力和分工的发展而变化，但是国家在表面上采取的仍然是脱离于各个阶级的政权组织形式。国家的管理对象是所有国民，无论是被统治阶级的成员，还是统治阶级中的成员，都受到国家法律的规制和约束。在社会主义社会，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但仍要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进行活动。

（二）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政体及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区别

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的本质是统治者进行阶级统治的机器，因此，国家的性质（国体、国家类型）是由统治阶级的性质决定的，并决定政体（政权的组织形式、政治形式）的性质。在阶级社会，国体对政权组织形式的决定作用并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即同一种国家类型可以选择不同的政权组织形式。例如，在资本主义国家，君主立宪制和议会民主共和制是主要的政治形式。至于各国所采取的具体形式，主要由各国统治阶级的利益、力量以及各国的历史文化决定。而在人民大众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社会，无产阶级的性质和历史使命决定了其政治形式只能是民主共和制。正如恩格斯所阐述的：“如果说有什么是毋庸置疑的，那我们就说，我们党和工人阶级只有在民主共和国这种政治形式下，才能取得统治。民主共和国甚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法国大革命已经证实了这一点。”^⑦总之，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性质和历史使命使得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国体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性质和国体。

（三）政治与经济关系的理论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从整个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来看，经济基础决定属于上层建筑范畴的政治。但从一定的历史横截面来看，政治的发展也具有相对独立

① 《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60页。

② 《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9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3页。

④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97页。

⑤ 《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55页。

⑥ 《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00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12页。

性，即政治并不完全按照经济预设的路径展开行动。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社会的政治结构绝不是紧跟着社会经济生活条件的这种剧烈的变革立即发生相应的改变。”^①政治发展的相对独立性，意味着政治并不是完全被动的，在一定条件下对经济的发展起决定的反作用。由于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政治，具有高屋建瓴、统揽全局的地位和作用，因此，无产阶级政党一直高度重视政治问题。

马克思主义政党向来旗帜鲜明地讲政治。列宁认为，政治中最本质的东西是国家政权机构。^②由于国家政权机构能够保护自己的共同利益，免遭内部和外部的侵犯^③，因而政权在社会经济生活中起关键性作用。列宁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深刻认识到政治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他指出：“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处理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完成它的生产任务”。^④正因为如此，他在同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论战中提出了“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⑤的著名论断，并强调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的常识。毛泽东同志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们党执政后的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强调思想政治工作对经济工作和其他工作的重要性。他在《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按语中提出：“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⑥他还提出思想政治对经济的能动作用：“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⑦“提高劳动生产率，一靠物质技术，二靠文化教育，三靠思想政治工作。后两者都是精神作用”。^⑧他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进一步指出，思想政治是统帅和灵魂，引领经济工作和其他工作沿着正确轨道向前发展。基于此，他严肃地指出：“只要我们的思想和政治工作稍微的一放松，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⑨不过在高度肯定政治的统帅地位的同时，他也强调政治与经济工作和其他工作的统一，否则政治就成了空头政治，无本之木，从而也就无法体现和发挥其统领全局、高屋建瓴的地位和作用。1986年8月，邓小平同志视察天津时强调：“改革、现代化科学技术，加上我们讲政治，威力就大多了。到什么时候都得讲政治。”^⑩江泽民同志在《领导干部一定要讲政治》一文中指出：“我们搞现代化建设，中心任务是发展经济，但必须有政治保证，不讲政治、不讲政治纪律不行”^⑪。他明确了政治的内涵，包括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观点、政治纪律、政治鉴别力、政治敏锐性，并总结了讲政治的六大意义。胡锦涛同志认为：“在各项工作中要贯穿讲政治的要求，增强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⑫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更是把讲政治提升到党自身建设和发展的高度，他提出“旗帜鲜明讲政治是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要求”^⑬，“讲政治是我们党补钙壮骨、强身健体的根本保证，是我们党培养自我革命勇气、增强自我净化能力、提高排毒杀菌政治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46页。

②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54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3页。

④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42页。

⑤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41页。

⑥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49页。

⑦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39页。

⑧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4-125页。

⑨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51页。

⑩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66页。

⑪ 《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58页。

⑫ 《胡锦涛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360页。

⑬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48页。

免疫力的根本途径”^①。党的十九大报告把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摆在全面从严治党的首位，以点带面，全面加强党的执政水平和领导水平。

另外，政治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和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内涵。凡是涉及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全局性和根本性问题，都是重大政治问题。政治的首要内容随着国内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动而变动。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人民大众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矛盾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因此进行反帝、反封建以及反官僚资本主义就是我们党讲政治的主要内容，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都是为推翻“三座大山”服务的。例如，毛泽东同志在土地革命时期指出：“革命战争是当前的中心任务，经济建设是为着它的，是环绕着它的，是服从于它的”。^②改革开放后，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不发展社会生产力和经济建设，社会主义制度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风险。基于此，集中力量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就是讲政治的主要内容。在此背景下，邓小平同志提出：“四个现代化就是中国最大的政治”。^③进行现代化建设，“任何时候都不要受干扰，必须坚定不移地、一心一意地干下去。”^④邓小平同志以经济为中心的思想，同列宁的“今后最好的政治就是少谈政治”^⑤的思想，具有一致性。党的十九大以来，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事关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胜利进军这一大局。因此，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是当前中国最大的政治。总之，政治的内涵是变化的，既有阶级斗争方面的政治，也有经济方面的政治。因为党能够深刻洞察不同时期和不同发展阶段的政治内涵，所以党能够始终居于领导各方的核心地位。

二、党领导经济工作的实践依据

坚持党对经济社会的统一领导，是我们党在革命、建设以及改革的长期实践中所确立的政治原则。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领导经济建设为战胜中国人民的敌人奠定了物质基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的坚强领导是中央政府掌握中国经济和金融主权的重要保证，是提高社区组织化和社会化程度的重要力量。改革时期，党的领导是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是维护公平正义，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力量。

（一）新中国成立前党领导了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工作和建设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⑥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不同时期，我们党依据国内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建立了不同形式的政权，目的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领导全国人民完成反帝反封建任务。因此，这个时期我们党最大的政治，就是领导中国人民同敌人进行战斗。党的一切工作都要服务和服从于革命战争这个中心任务。

① 《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人民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42-43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23 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34 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76 页。

⑤ 《列宁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397 页。

⑥ 《列宁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110 页。

“战争不但是军事的和政治的竞赛，还是经济的竞赛”。^①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人民的敌人是非常凶狠和强大的，因此，战争是长期的、持久的，因而战争不仅是军事实力方面的比拼，更是经济实力的较量。为了支援战争，为战争提供物质基础，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各个时期，都十分重视领导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工作和建设。在土地革命时期，国民党对我红色政权采取军事“围剿”的“杀死政策”的同时，还采取了经济封锁的“饿死政策”。在这种情形下，只有进行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发展生产，才能解除敌人的经济封锁，为军事上“反围剿”的胜利奠定物质基础，为革命战争的胜利提供必要条件。毛泽东同志在《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中指出：“只有展开经济战线方面的工作，发展红色区域的经济，才能使革命战争得到相当的物质基础，才能顺利地展开我们军事上的进攻，给敌人的‘围剿’以有力的回击。”^②进行经济建设还能够改善群众的生活，激发群众参与革命的热情和积极性，从而壮大革命队伍。因此，他提出只有发展红色区域经济，“才能使我们的广大群众都得到生活上的相当满足，而更加高兴的去当红军，去做各项革命工作。”为了服务于革命战争这个中心任务，他一方面让根据地的干部、群众“懂得经济建设在革命战争中的重要性”^③，另一方面他强调根据地的经济建设不能脱离其服务和服从于战争这个实际，“在国内革命战争中企图进行和平的，为将来所应有而现在所不应有的，为将来的环境所许可而现在的环境不许可的那些经济工作，只是一种瞎想。”^④

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领导根据地人民进行经济建设，为抗日战争的胜利提供物质基础。在抗日初期，毛泽东在《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中提出：“财政政策以有钱出钱和没收汉奸财产作抗日报费为原则。经济政策是：整顿和扩大国防生产，发展农村经济，保证战时生产品的供给。提倡国货，改良土产。禁绝日货，取缔奸商，反对投机操纵。”^⑤随着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军对我们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的扫荡，实行“三光”政策，同时国民党顽固派对陕甘宁边区进行经济封锁，再加上边区受到自然灾害的影响，根据地发生了极大财政困难。为此，毛泽东同志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⑥的经济和财政工作总方针。他号召根据地的机关、学校和军队进行“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大生产运动，使得根据地军民渡过了抗日战争最为困难的时期，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此外，党在这个时期还实行了减租减息、精兵简政，逐步建立起统一的货币市场等政策，为推动根据地的生产事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在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提出按照“一切靠自力更生，立于不败之地”^⑦的方针建设解放区。“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⑧，“如果我们能够普遍地彻底地解决土地问题，我们就获得了足以战胜一切敌人的最基本条件”^⑨。因此，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是解放区建设的中心问题。在全面解放战争爆发前夕，党中央发布“五四指示”，将在抗战时期实施的减租减息政策变更为“耕者有其田”政策。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后，我们党颁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进一步激发农民参加革命和生产的积极性，从而为解放战争输送源源不断的人力和物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24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0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1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3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56页。

⑥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1页。

⑦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88页。

⑧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2页。

⑨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52页。

力。除了对农村进行土地革命外，我们党还提出对官僚资本采取没收政策，对民族工商业采取保护和限制并举的措施。

党领导根据地经济建设，除了服务于战争外，还为新民主主义政权奠定了物质基础。在政治和经济关系中，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政治发展能够超前于当前的经济发展，但这种超前是有限度的，并且是暂时的。因为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需要同一定的经济基础相匹配，否则，政治上层建筑会出现“高处不胜寒”，面临崩塌的危险。毛泽东同志认为，判断一个地方的社会是否为新民主主义社会性质，主要“以那里的政权是否有人民大众的代表参加以及是否有共产党的领导为原则”^①。按照此原则，我们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以及解放战争时期的政权，都具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因此，为了巩固不同时期的民主政权，需要发展相应的新民主主义经济作为支撑。毛泽东同志指出：“新民主主义国家，如无巩固的经济做它的经济基础，如无进步的比较现时发达得多的农业，如无大规模的在全国经济比重上占极大优势的工业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交通、贸易、金融等事业做它的基础，是不能巩固的”。^②

另外，党领导根据地经济建设能为将来过渡到社会主义提供前提。新民主主义经济是共产党领导的，体现各个革命阶级经济利益的一种向社会主义过渡型的经济。因此，它既具有社会主义经济成分，也具有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党在革命根据地领导建立的军工、民用、金融以及交通运输业等属于国营经济，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在土地革命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这些国营经济同私人经济相比，还不占优势，但“前途是不可限量的”^③。“争取国营经济对私人经济的领导，造成将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前提”。^④解放战争时期，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国营经济在国民经济比重不断上升，到建国时期，已经在工业、交通运输、金融等领域处于主导地位。国营经济地位的提升并实现对私人经济的领导，为向社会主义过渡提供了前提。

（二）党的领导是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

法治兴则国家兴，法治强则国家强。依法治国是我们党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正反经验、教训基础上得出的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主要内容和重要依托，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要求。同时，党又必须领导法律、法规的制订，才能把党对国家和社会治理的思想转化为国家意志，这关系到党执政兴国、人民幸福安康以及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新思想、新理念、新战略，开启了法治中国新时代。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是党的历史上首次以全面依法治国为主题的中央全会，对全面依法治国进行了顶层设计和战略部署，提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⑤。党的十九大报告再次明确了这一总目标^⑥。为加强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集中统一领导，统筹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工作，党中央于2018年3月决定组建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这是党的历史上首次设立此类型机构。2020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历史上首次召开的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上，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85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81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3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0页。

⑤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4页。

⑥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15页。

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推进全面依法治国需要抓住的重点工作，精辟概括为“十一个坚持”。此次会议将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全面依法治国的指导思想，是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将全面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放在了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彰显出我们党对执政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把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推向了新境界。

党的领导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党的领导贯穿于依法治国的整个过程和各个方面。首先，党领导制定法律。制定法律不仅涉及立法的数量，还涉及立法的质量。光有有法可依是不够的，是否符合社会主义价值取向，是否汇集人民的意志和诉求以及是否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才是关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群众对立法的期盼，已经不是有没有，而是好不好、管不管用、能不能解决实际问题；不是什么法都能治国，不是什么法都治好国家”。^①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工作路线，使得党能够在广泛征集民意的基础上形成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将党的主张上升为国家的意志，形成法律，使其成为全民遵守的行为规范和准则。其次，党监督法律的实施。法律是治国之重器，其生命在于执行。只有将党领导人民制定的法律付诸严格的实施，才能彰显出法律至高无上的权威和价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有了法律而不实施、束之高阁，或者实施不力、做表面文章，那制定再多的法律也无济于事。”^②然而，若国家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的执法活动不受制约和监督，那么就会滋生腐败。原因在于，“没有监督的权利必然导致腐败，这是一条铁律”^③。为了加强党对反腐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党中央对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作出了重大决策部署，将国家监察委员会同党的纪律监察机关合署办公，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党员干部、公职人员进行全面监督，确保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在阳光下运行。

党不仅领导制订法律，保障和监督法律的实施，而且，党的领导所依据的方针、政策，能够弥补法律、法规的滞后性和盲区，这既可以保护和引领经济社会中出现的新生事物，又可以防止出现无政府的盲目现象。法律的稳定性特征决定了其自诞生之日起就存在滞后性问题，以至于对日新月异的社会经济带来的新问题新现象，缺乏足够的预见性和应对能力。而法律的滞后性可通过党制定的政策来弥补。党的政策和法律本质上具有一致性，都是人民根本意志的体现，因而都代表着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政策具有指导性、灵活性、迅速性等特征，因而能够有效应对新形势下面临各种新问题。另外，在实践中被证明有效的党的政策，可通过法定程序成为法律。因此，党的政策既可充当法律的试验田作用，又能有效地弥补法律的滞后问题。同时，党的作风是带动政风、社会风气的关键，是以德治国的依据。以德治国是依法治国的重要补充，这是国家治理、经济治理的必要手段。法律和道德都有规范社会行为，维护社会秩序的功能，但各有侧重。依法治国强调以法律的权威和强制性来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而以德治国则强调以道德教化为手段来稳定社会秩序。正如依法治国的前提是科学立法一样，以德治国的前提是社会成员已经有了一定道德水准。因此，我们要坚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传统美德，提高社会成员的道德修养水平，营造出全社会懂法、守法的浓厚氛围，强化社会主义道德对依法治国的支撑作用。

（三）党的领导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

① 《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43 页。

②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150 页。

③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1 卷，外文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418 页。

只有党的领导，才能使国家建立强有力的政府，才能建立和完善坚强的国家治理主体，才能有效行使国家经济主权和金融主权。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 28 年的浴血奋战，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成立了新中国。党的地位也从领导人民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党，转变为领导人民执掌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新中国成立伊始，为了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党领导人民同敌对分子进行了一系列斗争：大规模的剿匪斗争、镇压反革命运动、打击不法投机资本等。在外交方面，人民政府废除了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取消了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特权，清除了帝国主义在华的残余势力和影响。通过巩固新生政权的一系列斗争，新中国掌握了政治主权，为其掌握经济和金融主权铺平了道路。

党领导人民掌握了国家的经济主权，主要是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和统一全国财经工作实现的。**新中国成立前**，以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本在工业、金融、矿业、交通运输业、内外贸等行业、部门中具有垄断地位，掌控着国民经济的命脉。因此，没收官僚资本，使其成为社会主义性质国营经济的物质基础，是党和人民掌控国家经济主权的关键。解放战争时期，人民解放军每解放一座城市，便展开了没收官僚资本的工作，但大规模的实施是在**新中国成立后**进行的。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凡关系到国民经济命脉和足以操纵国计民生的国民经济，已经被牢牢的掌控在党和人民手里。基于官僚资本组建的国营经济，成为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为全面恢复国民经济奠定了物质基础。统一全国财经工作，是党和人民掌控国家经济主权的另一重大举措。为了从根本上稳定物价，除了打击非法投机资本外，还要着手解决全国财政收支、市场供求不平衡的问题。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的财政工作仍是分散经营的，老解放区的财政收入主要用于当地支出，而大多数新解放区尚未建立起正规税收制度，以至于中央政府一方面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另一方面要承担着军事费用、恢复生产建设、赈灾救济等巨额支出。“收在下面，支在上面，中央的日子就过不去了。”^①为了能让日子过下去，中央只能暂且通过发行大量货币方式来弥补收支差额，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初期通胀高企的深层次原因。为此，1950 年 2 月，中央财政经济工作委员会（中财委）决定节约支出，整顿收入，统一全国财经工作。全国财经的统一管理，不仅解决了旧中国长期的财政收支不平衡问题，还终结了国民党统治后期因恶性通胀而引起的物价飞涨局面，更为恢复国民经济和改善人民生活起到了关键作用。为此，毛泽东同志曾高度评价稳定物价的意义，称赞它的重要性“不亚于淮海战役”。^②

党领导人民掌握新中国的金融主权，主要是通过完成以下三大任务来实现的。首先，构建了以人民银行为核心的金融体系。主要工作包括：建立不同层级的人民银行分支机构，接管官僚资本银行，合并解放区银行，取消外资银行在华的一切特权，整顿和改造私人金融机构，建立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及其分支机构。其次，构建人民币本位制。采取的措施主要包括：使人民币成为统一流通的唯一合法货币，收兑各解放区发行的货币，彻底肃清国民党发行的货币，禁止金银计价、流通和私相买卖，禁止外国货币流通、计价和计算，由人民银行统一外汇管理。再次，最为关键的是，通过国家政权的镇压手段，严厉打击在上海等大城市由国民党潜伏特务策划的“金融战”，并通过老解放区政府向大城市紧急调运居民生活必须物质来稳定人民币的物价。通过完成以上三大任务，新中国建立了统一的货币市场和金融体系，有效遏制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恶性通货膨胀，稳定了

① 薄一波：《若干重大事件与决策的回顾》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58 页。

② 《中国共产党党史》第 2 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59 页。

金融物价。人民政权是人民币发行和稳定的最重要基础，这是新中国经济建设的重要经验和规律，为新中国成立后长期的人民币币值的基本稳定指明了方向。代表中国经济和金融主权的人民币发行与币值稳定的历史，说明了国家信用的基础性和可靠性，而国家信用的可靠性来自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

人民政府的威信来自党的宗旨和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新中国中央政府，保障人民在政治上成为国家的主人，在经济上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1956年后），这使得中央政府和各级政府在人民群众中树立起崇高的威望和公信力。而政府享有这种崇高的威信来自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和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党的根本宗旨，并在1945年中共七大被写入党章，此后，历次修改的党章始终将其作为党的根本宗旨。党不仅公开向全世界宣布了她为人民服务的根本目的和意图，而且通过广大党员的实际行动来践行这个宗旨。党除了广大人民利益外，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党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无论在革命年代，还是在建设、改革时期，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为国家和人民无私奉献，在工人、农民、士兵、教师、医务人员、科技人员、政府公务员中涌现出无数普通的优秀共产党员，他们甘于奉献、勇于牺牲，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共产党人“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的入党初心和誓言。正是党的宗旨和广大党员的先进模范作用，使党领导下的各级政府在人民心中树立了极高的威信。

党的领导能够提高社区的社会化和组织化程度。在整个社会经济活动中，在政府主体管治之外，还存在广泛的组织化、社会化程度很低的社会阶层及其经济活动。例如，对于广大农村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组织化和社会化，政府功能难以覆盖，需要党的领导，使其提高组织化和社会化水平，从而使之与国家的现代化建设相适应。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农业合作化是明显的范例。新中国成立初期，基于农民土地私有制基础上的小农经济，既无法为工业化建设提供足够的粮食、工业原料以及资金，也无法为工业品提供足够大的市场。因此，需要引导个体农业走向合作化。通过农业合作化运动，农村的个体经济被改造成集体经济，农村的生产力得到解放和发展，为工业化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在新时代，农业合作化是提高农民收入和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在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将分散的农民组织起来，提高农业组织化和集约化程度，走农业合作化道路，既能有效提高农民的收入和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又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引擎。农业合作化适应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方向，“走好农业合作化道路，我们要总结经验，在全国不同的地区实施不同的农业合作化道路。”^①

在城镇，无论在改革开放前后，我国在工业化发展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进程中，党的领导都是国有企业管理和现代企业制度的主体。尽管新中国成立以来国有企业在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四个现代化建设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国有企业管理问题就是突出的问题之一，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这也就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②新中国成立后，党一直探索国有企业管理的有效方法。受列宁“一长制”理论的影响，及党在革命时期的根据地建设经验，新中国成立初的国有企业，主要采用的是“一长制”管理体制。但这一套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并不符合我国的具体国情，因此，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管理体制刻不容缓。20世纪60年代初，鞍钢总结出一套企业管理的基本经验，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

① 习近平：《因地制宜 走好农业合作化道路》，<https://www.chinanews.com/gn/2020/07-23/9245890.shtml>。

②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4页。

制度，即“对企业的管理，采取集中领导和群众运动相结合，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不断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①毛泽东同志高度赞赏该套管理制度，称之为中国工人阶级创造的“鞍钢宪法”。1961年，党制定的“工业七十条（草案）”，将该套制度确定下来，使之成为一段时期内我国重要的企业管理制度，同时明确规定“国营工业企业实行党委领导下的行政管理上的厂长负责制”^②。“工业七十条（草案）”是新中国成立后首部关于国营企业管理的条例，对我国工业的调整、巩固、充实和提高起到了积极作用。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提出，国有企业党组织在企业发挥政治核心作用，以确保正确政治方向。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的战略高度，高度重视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高度重视国有企业党建工作，先后作出了一系列重大部署。2015年6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出台《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在国有企业党组织政治核心作用的发挥、领导班子和人才队伍的建设、反腐倡廉的落实方面提出了具体性的指导意见。这些具体指导意见，是新时期党加强和改进对国有企业领导的纲领性文件，具有鲜明的指导性、方向性。2017年10月24日，党的十九大通过了新党章，将国有企业党委（党组）职能表述为“发挥领导作用，把握方向、管大局、保落实、依照规定讨论和决定企业重大事项”，这为新时期国有企业党组织开展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是我国国有企业的光荣传统，是国有企业的‘根’和‘魂’”。^③只有坚持党的领导，国有企业改革才能朝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方向。只有坚持党的领导，发挥党的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才能将国有企业利益、职工利益以及国家利益统一起来，在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的目标中不断发展自身，从而夯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才能把现代企业中的资本治理、资产经营等体现市场经济规律要求的活动与劳动权益、工人群众参与企业管理等体现社会主义性质的本质属性紧密联系起来，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企业制度完善的基本价值取向。

三、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理论范畴

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一个世界性难题。西方经济学和西方政府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未能解决这个难题。但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给出了正确处理二者关系的中国方案，即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的同时，实现市场机制和政府作用的有机统一。

（一）西方经济学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

作为资本主义经济的上层建筑，西方经济学自诞生以来就主要肩负着两大任务：一是形成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学知识体系和价值观念，为资本主义长治久安提供社会公共品；二是总结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实践经验，为资本主义国家治理和资本垄断集团出谋划策。围绕这两大任务，西方经济学主要流派围绕政府要不要干预经济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在这些争论的派别中，凯恩斯阵营和古典学派的观点最为对立。古典学派强调，市场机制即“看不见的手”能够引导和

^①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5页。

^② 《中国共产党党史》第2卷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588页。

^③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176页。

调节资源的优化配置，而政府只是扮演“守夜人”的角色。凯恩斯主义则认为，市场机制因其内在缺陷的存在而导致市场失灵，因此，政府应当积极干预经济。两大学派的政策主张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不断交锋、各自发展为新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并交替成为经济思想的主流。在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之前，政策制定者主要信奉“看不见的手”原理。在接下来的40年来里，国家干预经济的思想逐渐成为正统思想。而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局面，将经济自由主义思潮扶上了正统经济学宝座。然而，这一思潮因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而遭到前所未有的重创，“看不见的手”总能够优化资源配置的神话也彻底破灭。在此背景下，主要发达资本国家主动“救市”，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监管，并于2009年的G20伦敦峰会达成国家干预经济的共识，在很大程度上宣告了国家干预经济思潮的回归。

尽管两大学派在政府与市场之间关系上的观点对立，但是它们探讨二者之间的关系的基本哲学观是一致的——二元论。这种研究视角将政府与市场看作平行而对立、非此即彼的关系。正是基于这种二元论研究视角，过去被认为是正确的宏观经济政策理论，今天可能被视为是错误的而遭到丢弃，反之亦然。由此可见，西方国家并没有真正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正尝试破解这个经济学上的世界性难题，其出路在于将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的同时，坚持和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二）党对政府和市场关系认识的不断深化体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品质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奇迹的关键在于我们不断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我们党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创造性地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既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又发挥了市场机制的长处，这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弘扬与时俱进的精神，不断深化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和探索。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个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表述，意味着我们党首次打破了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相对立的观念枷锁，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对政府和市场关系认识和探索的一次重大飞越。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讲话中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①邓小平的上述谈话突破了长期以来束缚人们的一种传统观念：“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使人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为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奠定了理论基础。党的十四大报告提出“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这一重大理论突破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从党的十六大到党的十八大，“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这句表述前面关键词^②的变化，传递了经济体制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73页。

^② 党的十六大指出：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七大指出：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八大指出：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

改革突出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的重要信息，为之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达到一个新境界，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思想指导。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的发挥政府作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从“基础性作用”转向“决定性作用”，同时强调“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一次新飞越。2020年10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政府和市场关系做了深刻总结，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这一新论述为今后一个时期深化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明确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三）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关键在于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

理论和实践均证明了市场是配置资源最有效的方式，然而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前提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的十九报告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在于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产权制度能够允许、鼓励和保护市场主体公平地参与经济活动，激发各种市场创业热情和创新活力。要素市场化配置的实质是指市场主体通过市场交易的方式来实现要素的优化配置，这以要素的产权明晰、保护有力以及流转顺畅为前提。尽管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的产权制度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在产权界定和产权保护方面仍存在诸多问题与挑战。解决这些问题和挑战的根本出路在党的领导下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要使得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除了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外，还需要政府简政放权。受长期计划经济体制惯性的影响，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仍不少，这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同时因政府的权力过大而产生腐败。因此，需要划清政府与市场的界限，凡是市场机制能够调节的经济活动，应当取消行政审批和许可，推动资源配置依据市场机制实现效益和效率的最大化。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但不是起全部作用，需要更好的发挥政府的作用。尽管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最具有效率，但由于外部影响、垄断、不完全信息等因素的存在，使得市场机制不能有效地配置资源，于是市场失灵便出现了。同时，市场经济的自由性和竞争性特征必然导致优胜劣汰，一定程度使得收入在贫富之间、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差距越来越大，这与社会主义本质相违背。因此，需要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来解决市场失灵，促进共同富裕。然而，政府或因掌握的信息不完备而造成决策失误，或因作为相对独立的财政利益主体和局部本位利益而追求局部地方利益，造成不顾大局或越位错位，或因市场主体寻租行为而造成腐败，进而导致政府干预失效或失灵。

（四）加强党的领导是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的根本保证

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解决政府干预失灵的根本出路。首先，加强党的领导保证中央和地方利益的统一。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决定了党及其地方和微观组织不允许拥有独立的经济利益。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各级政府都受到同级党委的领导和监督，而实行垂直型领导的各级党组织能够及时将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传达到同级政府，同时党具有严密的组织性和纪律性，确保了中央决策的有效通达和执行效果。其次，加强党的领导保证经济发

展的正确方向。马克思指出：“一个单独的提琴手是自己指挥自己，一个乐队就需要一个乐队指挥。”^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其根本保证是我们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统一领导。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②在坚持党的领导，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四方的领导核心作用的同时，不断提高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和定力，就能保障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再次，加强党的领导是遏制腐败的良药。纵观党的百年发展史，既是一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又是一部反腐倡廉史。反腐是我党一贯坚持的鲜明政治立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被摆在突出位置。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采取一系列新举措来构建“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体制机制”，促使广大党员干部、公职人员拧紧“不敢腐”阀门，扎实“不能腐”篱笆，筑牢“不想腐”堤坝，从而夯实了党的执政基础、巩固了党的执政地位。

正确处理党的领导、政府作用和市场机制这三者的关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研究对象。无论是传统凯恩斯还是新凯恩斯理论，都是以资本主义私有制市场经济是最有效率的前提下构建的理论体系，它们都认为政府干预理论建立在市场失灵基础上的，从而将政府同市场对立起来了。因此，无论怎样论述和强调政府的作用，实际上都没有跳出西方经济学的理论范式。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的特征和最大优势。在党的领导下，我们在40多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过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改革开放开始的，因此应该是40多年的伟大实践），不断深化认识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从辩证统一的视角认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即相互补充、促进的对立统一关系。这种对政府和市场认识的视角，显著不同于西方主流经济中的二元对立思维。同时，与西方经济学关于政府作用仅局限于弥补市场失灵的观点截然不同，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政府作用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性质和国家（政府）是“天下之公器”的悠久文化，决定了政府的作用除了弥补市场失灵外，还要在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民生福祉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正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政府的作用体现在：“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管理，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最后，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实现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之间有机统一的关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最大特征，就是在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创造性地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并朝着社会主义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党是无产阶级联合的最高形式，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凭借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党能够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四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有效避免了政府在干预经济过程中的“越位”“缺位”以及“错位”现象，从而为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创造了条件。可见，实现政府作用和市场机制的统一，关键在于加强党领导，这也是我们真正突破西方经济学思想束缚的关键。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重大成就，全面深化改革取得重大突破，这有力证明了加强党领导下的“市场有效，政府有为”的这种辩证统一关系是完全科学的。因此，正确处理党的领导、市场机制以及政府作用这三者间的关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重要的研究对象，也是其重要的逻辑关系。我们要认真提炼和总结党领导下的政府与市场关系实践的规律性成果，为构建和完善中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08页。

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16页。

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做贡献。

四、结束语

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来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核心作用和伟大贡献说明，党领导一切，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文明的模式，这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党既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又广泛扎根于中国最广泛的民众之中，吸纳社会各阶层的先进分子，成为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在哲学意义上，她是所有矛盾事物转化为统一体的决定性力量；在长期革命实践中，她把武装斗争与统一战线成功联系起来；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衔接中，她把广大农民分田分地与农业合作化、集体化成功联系起来；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她把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成功联系起来；把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成功联系起来。这种文明模式在人类社会发展中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是中华文明对当代世界文明的新贡献。

参考文献：

-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 《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 《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Analysis of Party Leadership on Economic Work

PEI Changhong NI Jiangfei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China)

Abstract: Upholding party's leadership on economic work is an important political principle established by our party in long-term practice of revolution, construction and reform. In the great practic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ummarizing the party's leadership and rule of law,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market are the objective requirement for building and developing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conclusions drawn in the paper are as follows: Supporting the war and building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new democratic regime are the main goals of the party leadership on economic work during the revolutionary period; The party leadership ensures the formul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law to make up for the lag and blind spots of the law. The

party's style of work is based on the rule of virtue; The party leadership enabled new China to establish a strong government, thereby effectively exercising its national and economic sovereignty. The prestige of the government at all levels in new China comes from the purpose of the party and the exemplary and leading role of party members. As far as the classes and their economic activities are low in socialization and organization, the party leadership can improve their level of socialization and organization, and adapt them to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Correctly handling the relationship among the party leadership, the role of government and market mechanism is an important research object of socialist political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it's also the key to break out of the shackles of Western economic thought.

Keywords: Party Leadership; Economic Work; Government and Market; 100th Anniversary of founding of the Communist Party